

青年视界·沈杏培主持

重返发生现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机制与类型重勘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不能简单化约为若干“现代性”指标在文学中的逐项落实,也并非从一条连贯而递进的线索中自然伸展出来。自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打破单一政治叙事以来,学界历经了审美自律的回归、文献史料的挖掘、文化研究的转向,直至今日,我们似乎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宏观的理论框架在解释具体历史现场时常显得力有不逮;另一方面,对于微观史实的穷究若无深层的问题意识加以贯串,亦不免流于短钉之讥。因此,所谓“重勘”,便不止于对旧话题的复述,而是一种兼具解构与建构的学术姿态。这要求我们重返文学生产的原初场域,潜入刊物媒介、同人聚散、译介传播、文体观念的复杂肌理,在“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动态交汇中,去追索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如此”的生成机制。这种重返,既是对既有文学史大叙事的审慎祛魅,亦是对现代文学内在景观的深度激活。

本期《青年视界》栏目推出的两篇文章,复旦大学博士生凌建辉的《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生成及其现代性》与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张炎的《莽原里的朝花:〈莽原〉转型与〈朝花夕拾〉的创作发生》,正是上述学术路径中两例富有锐气的实验。它们分涉“小说类型”与“经典文本”两个维度,在方法论上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呼应。两位青年学人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对宏观思潮的空泛描摹,而是选择潜入历史地表,以扎实的史料钩沉与敏锐的理论思辨精耕细作:凌建辉致力于考察战争小说如何从一个宽泛的题材泛称,凝聚为具备明确审美规范与理论自觉的小说类型;张炎则以《莽原》杂志为轴心,层层剥开鲁迅《朝花夕拾》经典文本背后的编辑策略、同人博弈与译介影响。

凌建辉的论文对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的发生学考察,具有鲜明的理论重构勇气。既往的战争文学研究,或被笼统置于主题学范畴内加以通览,或径直落入左翼文学、抗战文学的政治叙事框架,其作为独立文类的审美规范与生成逻辑,少有被置于中西文学观念博弈的延长线上加以深究。本文的突破在于,它拒绝在题材意义上泛化处理,而是将“战争”在现代中国如何被重新对象化,确立为核心命题。作者以清晰的史家眼光,勾勒出一条从晚清至抗战的理论与创作脉络:晚清小说将战争从“天命—王朝”的传统秩序中剥离,使之成为进化论视域下的竞存观念对象;“五四”之后,茅盾在“非战文学”论争中确立了“经验真实”与“辨析战争政治属性”的双重标准,为现代战争小说注入了独特的伦理灵魂。文章最有张力之处,在于揭示出中国现代战争小说对西方反战文学范式的超越;它不曾滑向《西线无战事》式的幻灭与虚无,在丘东平等七月派作家笔下,将民族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与个体生命的严酷痛感熔铸为一种“精粹的英雄主义”。这一定位,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战争小说“现代性”的一次精准命名,也为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如何在反抗与借鉴中确立自身主体性,提供了一个坚实而有力的阐释范例。

如果说凌建辉的文章捕捉的是外部历史事件(战争)向文学内在形式(小说)艰难转化的轨迹,那么张炎的论文则从文学场域的内部媒介逻辑出发,揭示了经典文本生成

的微观政治。对于《朝花夕拾》，学界历来的研究多聚焦于文本内部的童年叙事、民俗记忆或“整本书”的结构分析。张炎却另辟蹊径，将目光转向其刊发载体——《莽原》半月刊的转型过程。作者通过对《莽原》从侧重“批评”的周刊转向“文艺”的半月刊这一史实的精细梳理，定位了1926年鲁迅文类意识的位移与身份策略的调适。文章揭示出一个颇具症候性的细节：当狂飙社同人与未名社成员因观念分歧走向裂变，作为主编的鲁迅为维系刊物生命、重塑文艺方向，刻意将那个杂文锋芒的自我暂置于《语丝》等阵地，而在《莽原》中重启了“文学鲁迅”的写作。“旧事重提”系列由此既是对个体记忆的打捞，更是对刊物风格的主动干预与塑形。更见功力的是，张炎进一步将《朝花夕拾》置于《莽原》同期的译介语境中，考察《小约翰》《小儿的睡相》等译作如何为鲁迅的回忆提供了“儿童”“自然”“死亡”等母题的对话空间，使私人记忆获得了民族寓言的深度。鲁迅离京南下，书斋的暂时宁静与环境的污浊互搏，“教师”与“战士”的身份焦虑再度浮现，终使《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在温和的回忆中重燃杂文式的感愤。经由这番考察，《朝花夕拾》从一座文学史的孤岛，还原为一张交织着同人纠葛、编辑策略与译介互动的立体网络。这一研究路径，无疑为经典重读开辟了新的外部空间。

两篇文章并观，我们不难发现一种令人振奋的学术进取心。两位青年研究者面对战争小说、经典散文这样的老话题，主动沉潜至历史现场的矛盾、裂隙之中。无论是战争文学理论建设中的概念缝隙，还是著名同人刊物运行中的人事波澜，都被他们敏锐地捕捉并转化为具有学术生产力的论据。与此同时，他们的视野又极具开放性：凌建辉始终以西方现代战争文学范式作为潜在对话者，张炎则在钩沉《莽原》内幕的同时紧扣“思想革命”与“文学建设”的时代主题流转。这种兼具微观考据的沉潜功夫与宏观结构的理论视野的研究姿态，正代表了当下现代文学研究在代际更替中走向纵深的某种可能。

当然，所谓“重勘”，其意义本不在于提供终结性的结论，而在于打开新的问题空间。正如鲁迅与胡适因其对现代中国道路的两种人格化呈现而成为永恒话题，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之谜，也因其缠绕着古今之变、中西之争、革命与审美的多重纠葛，而始终保有被重新激活的学术势能。我们期待，这两篇文章能够成为引玉之砖：从晚清到“五四”、从抗战到当代，还有多少文类的生成同样隐藏着如此的观念博弈与媒介互动？除了茅盾的理论建设，其他批评家对文学规范的构想起到了怎样结构性的作用？《莽原》之外，《现代》《文学季刊》等刊物又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重返现场，既是为了更切近地理解历史，更是为了在与历史的有力对话中，为我们审视当代文学的处境与走向，觅得那些历经淘洗而愈发澄明的思想资源。

期待更多的同道学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更为清醒的问题意识与更为扎实的学术劳作，共同廓清中国现代文学蜿蜒生长的内在机理，让那些被宏大叙事遮蔽之处，重新焕发出思想的光彩。